

偉大的感染

在邁入庚子年的門檻，卻迎來了一場瘟疫，迅速傳播全中國，還衍及域外。雖然各方協力作有效防禦，在戰爭下，還是頗有生命傷損，經濟上的影響還在其次。傳播媒介，是由於人在地面上的流動。

人類的文明，就是一部交通史。人總是在尋找甚麼。陸地的邊界盡頭，還想超越海洋。

十五世紀的中國，領先征服海洋的遠航。

明永樂三年(1405)，鄭和率領下西洋(印度洋)從東海岸啓航，比哥倫布航行(1492)發現美洲，早了幾近一世紀。

鄭和的艦隊包括：寶艘六十三，中小艦艇二百餘，軍隊二萬七千餘人。艦隊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寶艘，有九桅，長約五百呎，濶一百八十呎，是水面上首次出現的巨舶。問：為甚麼稱為“寶艘”呢？不是巨大為寶，而是因為容載珍寶。

這次遠航，的確不同尋常。

首先是遠航的使命，既不是武力征服，也不是貿易，而是為宣揚國威。

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，出身貧寒，沒有學問。取得政權後，嚴重的自卑感反射，使他不安。中國傳統以文取士，文人治國；他凌辱文人，殘殺儒士，比異族元朝的統治者還沒有文化，甚且不任宰相。永樂皇帝朱棣，篡了他侄兒的帝位，更加上心理的愧咎不安。那麼有誰可以信任呢？只剩下親近他的宦官太監鄭和，原姓馬，小名三保，是回教徒，賜他改姓鄭。這鄭和從小在他身邊長大，又參與“靖難”爭位戰爭；得朱棣非常的信任。恰巧在攻入南京時，皇宮起火，顯然是皇帝自焚；只是遍覓不得燒焦的御體！這使取代帝位的叔叔大為關心。

雖然有人如此推想，但不知是甚麼綫索，使叔皇的目標轉注海外。

鄭和到底很忠心。一生先後出洋八次，從近海，到非洲東岸，和阿拉伯地區，也到達麥加；只是鄭和因為隨主子改宗佛教，不方便上岸。他代表天子，大方慷慨的到處無功賞賜；遠比番邦進貢的為多。反正巍峨寶艘，裝載量很大，可見天朝的富庶。他也蒐集些珍禽異獸，帶回中國。偶然也遇到小規模的攻擊，只施以有限的牛刀殺雞，不費多大力氣。其餘則是扶助當地政權，安撫秩序而已，談不上用兵。所以是真正的和平航行，不像後來暴虐的東西洋帝國主義者，欺凌掠奪，搜刮勒索。

鄭和並不是軍事天才，也未用武力侵略；這倒也好。可惜他的是他欠缺文韜。當然，歷史不能假定。設使鄭和讀書博學，或帶上幾名文人，承負宣揚文化的使命，那將會有更為深入久遠的影響，該是多麼理想的事！可惜，朱明時代，少人有如此理想。

無論如何，1433年(宣宗宣德八年)鄭和末次出使歸來，歷史常是人亡政息，天朝恢復自滿傲慢的鎖國時期。

人類文化的傳播，在於有使者和媒介，更源於使命感，最終推究到賦予使命者。

追溯到第一世紀，復活的耶穌基督，把傳揚福音的大使命，授予蒙揀選有忠心的使徒：

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。所以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；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(太二八:18-20)

使徒們忠誠迅速的行動，梯山航海，把主全備的道傳播出去。使徒保羅被聖靈引導西往歐洲；使徒多馬東行，將福音傳至印度。據傳，漢明帝夢見金人，蔡愔等奉使去西行求法；他竟然於永平十年(A.D. 67)偕西域僧歸！這都還是第一世紀的事。幾年後，羅馬軍攻破耶路撒冷，焚毀聖殿，屠殺人民，猶太人被迫分散各地，也有的來到中國。但他們中間沒有傳播福音的基督徒。

唐太宗李世民，貞觀三年(629年)，玄奘潛往印度求取佛經。貞觀九年(635年)景教(涅斯託利派)的宣教士阿羅本來到長安；皇帝很像聖經中的波斯古列王，對宗教持開明態度。唐皇帝姓李，對本土的道教，託創始人李耳為其本家，基本上最為支持；但認為其他宗教導人為善，為皇家祈福，也是多多益善。因此，諭宰相房玄齡至郊外迎接，並居住館舍，建寺賞賜。“景僧”(宣教士本土化名稱)則把皇帝“聖像”奉於寺中，為皇帝祈福。後來安史之亂，波斯景僧還投效郭子儀軍中，擔任偵探，“為公耳目”；這說明他們與人民相處，宗教軍政關係，都處理得很好，只是忽略了持守信仰(見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”)。景教雖興盛於一時，但因不注重教義，教徒蕪雜，遭致迫害，遂告枯萎。

元朝持宗教開明政策，成吉思汗因其母為景教信徒。蒙古語稱教士為也可里溫 (*Arkhawun*)，意思是“尊者”，並設有崇福司，形同官署，掌理教務。

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(1275年)，意大利商人馬可孛羅 (*Marco Polo, 1254-1324*) 來華，在上都(開平)晉謁世祖，垂詢西方人文政治，並在華任官。約二十年後，返抵威尼斯著述渲染中國之文化與繁盛。他還說：元帝請求羅馬派遣一百名博學能文的宣教士來華，教導其臣民明白真理。可惜，並未引起教廷的重視。但他對於中國富庶的描述，引起淘金者的興趣，成為東西交通史上具影響的書籍。

元成宗元貞元年(1294年)，方濟各會的意大利宣教士孟若望 (*Giovanni da Montecovino, 1247-1328*) 來華，先在泉州登岸宣教後抵北京元廷。他的方略是承襲涅斯託利教義，濫收教徒，一時號稱十萬，京師則有數千。1307年，孟獲羅馬授任大主教及東方教長。孟逝世後，元廷由衰而亡，依附朝廷的羅馬教在中國，也漸汨沒。

明萬曆十一年(1583年)，利瑪竇 (*Matteo Ricci, 1552-1610*) 來華，先居廣州；易華名利西泰。1587年，至南京，與當時的學者名流交往。1601年至北京，兼精通中西文字，數學，天文，輿地，醫藥，結識徐光啓，李文藻等人。羅馬天主教在華，漸復生機。湯若望 (*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, 1591-1666*) 繼利西泰事工，入翰林院，得在內廷傳教，使多名太監悔改皈信；並因天文計算精準，任欽天監正，其所修訂曆法，沿用至今。

宗教改革以後，威廉克理 (*William Carey, 1761-1834*) 為英國浸禮會遠方宣教先行者。他出身鞋匠，但心懷遠方，希望能夠足履東土。他自修聖經，往印度宣教，有方言的恩賜，把聖經或部分翻譯為四十餘種印度文字。他建立學校，設印刷廠，並在英國大學教授語文，改變印度文化，對於後世影響很大，成為遠方佈道模楷。馬禮遜為受其感召者。

馬禮遜 (*Robert Morrison, 1782-1834*) 英國倫敦會宣教士。1807年，受按立為牧師，宣教士，派赴中國。東印度公司的輪船拒絕載宣教士，只得經美國至廣州。後因其精擅中文，東印度公司還於1809年，任他為翻譯員。

1813年，米憐 (*William Milne, 1785-1822*) 澳門被逐，輾轉於爪哇，馬來亞，在英屬殖民地馬六甲立足；設立英華書院，教育華人子弟；並出版中文福音小冊。他利用英屬地

的自由空間，首創第一份中文新聞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，有馬禮遜，麥都思等參與其事，由1815-1821年發行80餘期，至米憐病逝而止。

梁發原受雇於米憐，刻製木版刊印福音書冊，因受熏沐於1816年信主；後來兼教中文。1827年，受立為第一位華人牧師。他撰寫了福音小冊出版；其中的勸世良言，分發到廣西落第秀才洪秀全手中，引起他對基督教的興趣，利用以發起他的上帝會，太平天國運動，攻伐及於大半個中國，卻以失敗告終；而其影響之大，則甚為明顯。

1814年，馬禮遜翻譯的中文新約聖經出版，獲格拉斯哥大學贈予神學博士。1821年，出版漢英字典。1824年，中文舊約聖經也譯成出版。馬禮遜回英國報告在華宣教事工，聲名大噪。1834年，在廣州逝世。

賓為霖(William Burns, 1815-1868)蘇格蘭長老會宣教士，於1847年至中國。在汕頭和潮州地區傳道，十分艱苦。他在上海遇到戴德生，曾帶領他一同工作，給他重大影響。以後賓為霖南至廈門，北上滿洲，傳揚福音；也曾翻譯約翰本仁的天路歷程為中文，並編訂聖詩。

戴德生(James Hudson Taylor, 1832-1905)英國約克郡藥房商的兒子。十七歲時，悔改皈主，成為循理派基督徒。曾讀習醫學，因熱心到中國傳道，未及畢業，就在1854年，至上海。但工作缺乏成效，兼值差會解散，少年離家萬里，孤立無援。賓為霖約他往汕頭工作，同住同工；還計畫戴德生施醫，傳道治病相輔並行。後來返英，完成醫生及接生訓練，通過考試。並於1865年，成立中國內地會召集宣教士同工，進入福音未普及的內地宣教，事工極具成效，經過艱難考驗，和庚子拳匪的迫害，仍然站立得住。

倪維思(John Livingston Nevius, 1829-1893)美國長老會宣教士，於1854年至中國寧波及杭州，1871年，移至山東煙台，引進蘋果，葡萄，及花生品種。主張自立，自養，自傳，為三自教會的原始概念，並為文闡述，稱為“倪維思方略”。一. 每一基督徒應作正經事業，自給自養，以生活在社區為基督見證。二. 各地方教會由信徒負責管理發展。三. 教會選擇培養有資格信徒，全時間事奉。四. 應以本地方式，被靠自己力量建立教會。他的原則並未獲充分注意。他去朝鮮宣教時，得該地教會採納，教會在那裏有效建立發展。他也注重讀經，及教會紀律。

美國宣教士林樂知(Young John Allen, 1836-1907)，於1859年來華。其時有太平天國未平，英法聯軍陷北京，情勢混亂可知；而美國則有南北戰爭，無以支持對外宣教。年輕的林樂知扶妻挈子，頗有一段艱難生活。創辦教會新報；於1868年九月五日始刊。1874年，為了推廣發行起見，改名為萬國公報，介紹各國新知，為當時文人閱讀。1882年，著名文人翻譯家沈毓桂參與筆政。那年，沈助林樂知開辦中西書院，學生達四百餘人，規模弘大。稍晚的聖約翰大學，學生還未達百人。1883至1888年間，萬國公報曾停刊。

1889年，萬國公報復刊，由廣學會的李提摩太任總理。關心國際主張的維新的大吏如李鴻章，張之洞，張謇等，都受其影響。知識分子如：康有為曾參加公報的徵文；梁啟超曾任李提摩太的秘書；孫文“上李傅相書”，即透過宋嘉澍懇請主筆沈毓桂(1807-1907)潤色，才能夠雅馴入目；後來於萬國公報發表。中國中西傳播巨人，有“長毛狀元”雅稱的王韜，曾在報上刊載“弢園文錄外編”；萬國公報並首先於1899年，介紹馬克思思想，為最早的傳播，可見其進步。光緒皇帝並集有全部萬國公報各期，呈供御覽。連日本天皇也特地購閱。可見其影響既深且廣，佈於海內外。其實林樂知對於中文所知有限，長於組織經營，筆政實全出於沈毓桂之手，先後撰文三百餘章發表，直到年事已高，於1894年，沈毓桂以“心血久竭”辭休，由蔡爾康繼任。沈以百歲高齡逝世於上海。

萬國公報於1907年停刊，同年林樂知逝世。

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, 1845-1919)，英國浸禮會宣教士，1870年至中國，先在山東宣教。1876年，山東大災荒，因慈憫為懷，李提摩太的名言：“關心拯救靈魂將來進入天堂，不能眼見他們的身體現在陷於地獄。”募集三萬兩銀子賑災。1879年，山西發生嚴重災荒，餓殍遍野。李提摩太謁巡撫曾國荃，復募集白銀十二萬兩賑濟災民。次年，結識名臣直隸總督李鴻章。1887年，至北京，從事文字工作。

1889年，李提摩太任上海廣學會總幹事，為萬國公報總理。1890年，並任英文中國時報主筆。李提摩太周旋於當世公卿之間，與他們都有個人交往，創立山西大學，有助於推動維新思想，成就甚巨。清廷頒賜一品頂戴，二等雙龍寶星章，誥封三代，榮寵厚賞，為所有宣教士第一人。

古約翰 (Jonathan Goforth, 1859-1936) 加拿大長老會宣教士，1887年，至河南開始工作，注重敬虔與能力。他喜愛聖經的經文是：“萬軍之耶和華說：‘不是倚靠勢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靈’。”(亞四:6) 在中國，歷盡艱辛疾病，所育十一子女，有五個因困苦疾病在華夭亡。1901年庚子拳亂，古身負刀傷，幾乎喪生。1907年，古約翰往朝鮮，親歷聖靈的大復興。回到中國，在各地聚會中，充滿靈力的講道，引領成千的人歸向基督，並訓練門徒佈道。晚年，失明並患病返國，巡迴宣講，仍極受歡迎，直至離世。

賈玉銘 (1880-1964)，山東昌樂人。1901年，畢業於文會館 (Dengchow College)。文會館為美國長老會宣教士狄考文 (Calvin Mateer, 1836-1908)，在山東登州 (蓬萊) 所創，為中國第一所大學，是東方哈佛。該校以中文授課，有理工科目，並有實驗室，工廠，及博物館。賈玉銘畢業後，繼入教士館 (神學院) 深造二年；學成受按立牧職，得人甚多。他成為中國第一位神學家，著述宏富；歷任神學教授，及神學院長；被創立靈修院，道德，文章，靈命，學術，俱甚豐厚，對於中國教會影響深遠。

宋尚節 (1901-1944) 福建興化人，父為衛理會牧師。自幼聰慧，在九歲時，於奮興會中信主，即熱心佈道工作。後赴美國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研讀應用化學；1926年，獲博士學位 (Sung Siong Ceh, Ph.D.)。蒙主呼召，轉而讀習聖經。1927年二月十日，在主前徹底認罪悔改，奉獻為主用，踏上歸國的道路。同年十一月返鄉後，在中學任教，熱心在城鄉佈道工作。

1931年，參加伯特利佈道團，成員共五人；計志文為團長，其他團員有：李道榮，聶子英，林景康等人。那年冬，在山東平度佈道會中，有美國巴教士，勸勉他應該為病人禱告醫治。有多人得痊愈，其中有一癱瘓十八年的婦人立刻得起來行走。此後，宋更加蒙主使用，神蹟隨着，證實所傳主恩惠的福音。

後來，宋尚節離開佈道團，應邀游行各地佈道，腳蹤遍及各省，並跨海至時為日本掠踞的台灣，及英海峽殖民地星加坡，馬來亞諸島，菲律賓，荷屬印度尼西亞等地，所至聖靈動工，蒙主賜福，聽衆多人認罪悔改，教會復興；並組織佈道隊，見證主名，傳揚福音，影響至今不衰。

1940年，因久患痔疾，在上海割治，發現有肛癌，轉北平協和醫院治療無效，在香山休養。在病榻上，日有查經，造就同工。這“東方的火焰”於1944年八月十八日息了，蒙主召返天家，領受他的冠冕。

使徒保羅蒙主呼召，不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，忠心作基督復活的見證，為猶太宗教人所恨惡，在羅馬巡撫前控告他：“我們看這個人，如同瘟疫一般。”（徒二四:5）顯然完全沒有稱詡的意思。不過，從“瘟疫”的發展來看，是真實的肯定其感染力，而且表明其畏懼。五旬節後的基督徒，同心合意見證主，“其餘的人，沒有一個敢接近他們；百姓卻尊重他們。”（徒五:13）耶路撒冷教會的執事腓利，把福音傳到撒瑪利亞，“在那城裏，就大有歡喜”（徒八:8）。這是福音感染力的表現。

如果基督徒失去感染，傳而不“染”，只作為人拍他肩膀，“無害”的人，自然不會為主的名被人恨惡，也就可有可無。我們仍然需要有良善感染的真基督徒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